书评|学林

（上接7版）

相关词作也有50多首。乃至有刘克庄作《落梅》诗，因“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而被控为讪谤当朝，坐牢十年的，所谓“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上博藏《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共八段，第四段起，因此也全都出自宋人。

就后者，与前及重六经讲习，好“察于人伦”的同时，理学家又好讲“明于庶物”（《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重“涵养须用敬”同时，又好讲“进学则在致知”（《程氏遗书》卷十八），故主张“以物为友”，每每极言“物，吾与也”，“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并常常“因闲观时，因静观物”，以“万物静观皆自得”自期自矜。如果说唐人每每为物所感，不免情以物迁，他们则觉得天下百事，宇内万物，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士人的心理在普遍内倾的同时，主体性因此得以大大增强。这种主体性既表现在能置物远、置心静和置语淡上，也表现在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明，可为大夫”的自负上。由此喜欢辨析细微，专注格物穷理。说起这种格物穷理，乃至藉此寄托微意或寄情方外的追求，正是宋学语境下士大夫心理趋于内倾、思考能力趋于深化的标志。

这里说到谱录类书，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上近于西人所说的博物学，它在中国发源于《诗经》《尔雅》，故《左传·昭公元年》中已有“博物君子”的说法，但在古代并未成为正式的学问，却成了宋人标志性的知识追求，进而成为弥漫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众多博雅君子，锦心绣口，宋初卢多逊以百二十首诗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山川地理，吴淑以百首赋论百种事物，人称“百篇科”。他们既即辞求事，复即事求意，进而赋诗托物，书画寄兴。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古今优劣》要岸然自命，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后世翁方纲《石州诗话》则由衷地承认，“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确实，观其坐讽一篇，能周知万品，又借题托比，触目起兴，常能于美刺法成、继轨风人之外，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隽永的修养，虽千载之下，仍使人感佩无已。

由此想到史尧弼《策问》所谓“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和陆游《吕居仁集序》所谓“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诚非自夸。明人徐有贞《重建文正书院记》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晚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将其贡献与影响说得至为清楚。当然，人们更熟悉的是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还有钱穆《理学与艺术》所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谱录的发达，正是其显而至显的表征。

对此，汤因比是用“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来表达对这个朝代的肯定，谢和耐则更具体地指出它比先秦更善感浪漫，更有好奇心，那时的人视野阔大，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又谦虚好礼，富有幽默感，且最重视交谈艺术，所以“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致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他的这个观察应该不排斥、甚至包括谱录一类的著作的吧。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冯至主编《德文月刊》考

卢铭君

笔者在整理民国时期由同济大学发行的刊物《德文月刊》(*Deutsche Monatsschrift*)时，发现冯至先生曾在该刊发表教辅类文章《德语成语类编》。冯至先生曾在同济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执教三年，并于1936至1937年间任该刊主编，目前学界对此鲜少关注。本文梳理史料，考辨《德文月刊》的复刊，勘察冯至主编该刊的历程。

1935年9月，冯至留德归来，在京暂谋得中德学会干事的差事。翌年，冯至经校友蒋复璁通过朱家骅被举荐至同济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冯姚平：《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冯至画传》)同济大学此时着手筹办文学院，计划发展为综合大学，对冯来说也有建设新学科的前景。

冯至任职后，将一部博士论文 *Die Analogie von Natur und Geist als Stilprinzip in Novalis' Dichtung* 赠予同济大学，扉页(见图)上有冯至手泽：“赠同济大学图书馆 著者冯承植”。同济大学图书馆首次登记时间为1936年10月2日。这说明同济大学是冯至学成归国后第一份教职，与其自传回忆的时间契合。根据落款，此时他仍使用旧名冯承植。

冯至在同济大学执教的成就之一是主编《德文月刊》。1924年春，同济大学中学部应学生的要求创办了课外学习刊物《德文月刊》，创刊主编为时任中学部教务长欧特曼教授(Prof. Dr. Wilhelm Othmer,1882—1934)。《德文月刊》系当时国内唯一学习德文的刊物(按：欧战前，中国曾有两份德文学习刊物《自西徂东》和《德华学报》，但都在《德文月刊》之前停刊)，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独特现象。该刊中德对照，旨在帮助德语学生学习德语，译文辅以脚注，补充背景知识，促使学生接触德国历史、文学和文化。常设栏目含德语文学作品(德汉对照)、名人名言、时文选摘、中国文学作品(汉德对照)、场景对话、应用文、文法等。第一二卷发行量达一千，影响颇大。《德文月刊》发行两卷后便于1928年休刊，主要缘由在于“翻译的工作吃力且费时”(德文月刊社：《重刊宣言》，载《德文月刊》1936年第3卷第1期)。《同济大学史》相关记载简略如下：

《德文月刊》……因故停刊……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准备复刊，由于该刊原主编欧特曼教授病故，主持乏人，加之翻译稿源又缺，因而未能如愿。……在本校教务处领导下，重建德文月刊社，由中学部主任冯承植教授主编。(翁智远、屠听泉主编：《同济大学史》)

此处存疑点有二。其一，德文月刊社何时重建。实际上，停刊后，月刊社实体仍存，维持营运：“每年照章选出其干事部之人员以管理之”(《德文月刊社略历及近况》，载《芥舟》1934年第2期)。另不乏读者来信购买存书，一方面实证其影响力，另一方面证明月刊社的存在。然而，干事能做之事惟有管理和售卖库存旧刊，编辑和出版陷入停顿。后月刊社于1932年重建，主要由于下文所提遭日方炮击一事。其二，冯至是否促成复刊。实际上，复刊并非在1932年事变后才启动。月刊社早有复刊计划，曾发文《德文月刊之过去与未来》述愿：

溯月刊创办迄今，屡蒙阅者赞许，并有催询延期之故者，足见本刊自有相当之价值，……现任校长张先生颇愿月刊之复活，本社同人及同学亦以月刊停版为可惜，故张先生有收归校办之意，所用经费悉由学校担任(德文月刊社：《德文月刊之过去与未来》，载《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28年)。

月刊社在休刊不久便有意复刊，且获校方支持，出版经费无虞。1931年，高三学生积极筹划出版，未料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同济大学惨遭炮击，月刊社不能幸免于难，损失惨重。后学校迁至吴淞，月刊社重建，但欧特曼无意担任主编一职，复刊一事就此搁置。1934年，欧特曼病逝，主编之位悬置。1935年，复刊才重回日程，获时任附中主任陆振邦的支持。1936年6月，《德文月刊》正式复刊。《重刊宣言》阐明复刊缘由：“这月刊在今日是更加需要了，因为同济的学生在增加，而中学的德文钟点却较前减少，所以学生要练习德语，非更靠自修不可。自修需要适当的读物。”复刊号封面登已故总编欧特曼的照片，《重刊宣言》重申首卷发刊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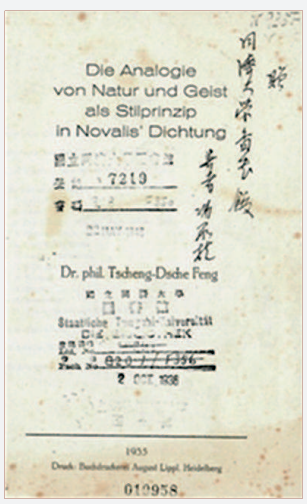
使学生易于从事于德文的学习，并由谨密的，适当的注释，为彼等开发读德文的德国文学和科学书籍的门径。近数年来，中国学习德语的为数渐多，且了解德国学术之价值的人，亦日益增加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论语第十五篇第九章）这个锐利的工具应在德文月刊中创造出来，而且希望它能使中国的青年，易于明瞭德国学术之精奥，并因此间接的辅助，促进近世中国学术之发达。(按：这段话原出自《德文月刊》的“发刊宣言”)

这段话重复了创刊号《发刊宣言》的宗旨。这足以表明月刊赓续旧刊、初心不变的愿望。耐人寻味的是，复刊号版权栏主编空缺。当年9月，冯至才开始担任大学部德语教授兼任同济大学附设高级中学及德语补习班主任。这表明，德文月刊社与学校教务处勠力同心，复刊工作经铢寸累积，在先生赴任前已有水到渠成之势，故复刊号并无先生痕迹，且复刊显然并非冯至先生促成。论及文学修养和德文水平，冯至作为享有名气的诗人和留德博士，都能胜任月刊主编一职，且身为附中主任，担任主编也是其职责所在。可以想见，冯至应月刊社和教务处之请挂帅。故1936年11月第二期起，“Feng Tscheng–Dsche”之名出现在主编一栏，换言之，冯至主编了第三卷第二期至第十期，而非第三卷全部卷期。第一期发行后，月刊社为新主帅额手称庆：“顷悉三卷二期，于该刊主任编辑冯承植博士领导下，不久即将出版。……该刊主任编辑冯教授以专攻德国文学哲学之资，出编德文月刊，吾人不禁为该刊前途庆也。”(德文月刊社：《德文月刊扩充内容》，载《国立同济大学旬刊》1936年第109期)

虽与前两卷相比，第三卷的文学占比下降，但保留中德对照的形式，在编排上沿袭前两卷设定的框架，设有论述文学文化的文章、德国和中国文学作品、情景会话和语法等栏目。复刊号既已定下基调，再易框架实属不妥，想必延续也是较为实在的做法，故第三卷整体框架并无大变动。月刊社原计划于1937年10月1日出第四卷，未曾料到“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同济大学内迁，发刊一事就此搁置。

面对前文所提稿源紧张的情况，冯至从所得教学经验和素材中辑录德文知识并提供给由己主编的月刊也是情理之中。在《德文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第149—150页和第六期第190—192页，冯至分两篇辑录了《德语成语类编》(*Deutsche Redensarten, nach Sachgruppen angeordnet*)。作者一栏标明“冯承植辑”。德文“Redensart”可解作“谚语性成语”或“习惯用语”。汉语成语通常为四字，而德文习惯用语通常为动词搭配介词词组或名词。在第五期，冯至按“思想”“考虑、思量”“注意”“不注意、忽略”“意见”“知识”“教”和“学”辑录了73条德文成语。在第六期，冯至按“记忆”“忘却”“惊奇”“失望”“聪明”“愚蠢”“狡猾”辑录了58条成语。从德语学习的视角来看，冯至先生辑录的成语到现今仍未过时，仍可为德语学习者的辅助材料。

1939年8月，冯至辞去前后约三年的同济大学教职，结束了中学德文教学生涯。转入西南联大后，冯至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走上一个巅峰，《歌德年谱》《审美教育书简》《十四行诗》纷纷问世。德国波恩大学特陶德文教授(Rolf Trauzettel)曾评价冯至为“诗人型的学者，学者型的诗人和翻译家”(张恬主编《冯至全集》第5卷)。这道出大多数人对冯至的印象。审视冯至一生，我们发觉，他在“幽婉的名篇”(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载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之外曾产出教学用书，曾主持过《德国文学简史》(1958)的编写，曾参加高等学校中外文系的教材编写工作，但教学显然被其诗歌和研究的光芒遮蔽。《德语成语类编》虽非文学作品，系教辅类辑录文字，但承载了教学经验和心得，说明先生在德语基础教学上下过不少功夫，并告知：冯至先生亦是一位师者。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德语系。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近代中国德文报刊文学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成果）